

“东陉关”究竟在哪里

刘淮南

提 要：由于对《水经注》中关于东陉关的佚文存在理解上的问题，所以导致不少人的误解，从而将东陉关予以位移。如果将该佚文重新断句并就其可能的错简予以修正，可以避免很多人由此产生的在确认东陉关位置上的误会。从实地考察出发，我们能够发现一些古人和今人对之理解时的欠缺。同时，以陉岭为参照而非陉岭与夏屋山为参照，自然可以明确东陉关即今天的雁门关。无论是历史记载还是客观的地理地貌，并结合行军路线，将峪口或者胡峪确定为东陉关都是不符合实际的。

关键词：雁门关 东陉关 西陉关 峪口 胡峪

一 “东陉关”不在峪口

雁门关因其在历史上重要的战略地位而闻名天下，而且还因其特殊的地理地貌即“双关四口”成为天下的唯一。这“双关四口”的“双关”即东陉关（今山西省代县 5A 级景区雁门关）与西陉关（铁裹门）。“四口”则是东陉关南面的南口和北面的新广武口，西陉关南面的太和岭口和北面的白草口。按说，这已经是多少年来大家的共识。然而，除了历史上的一些不同说法外，今人同样有着异议。近来又看到一篇对东陉关位置进行质疑的文章《“雁门关东陉说”辨误及相关问题》，作者认为东陉关在代县城东南的峪口而非人们一般认为的今雁门关。^①

续楠、王海之所以将峪口认定为东陉关，既有唐人杜佑《通典》中所说的雁门郡（今代县）“郡南三十里有东陉关，甚险固”^② 作为依据，又有北魏酈道元《水经注》中的佚文“雁门郡北对句注，东陉其南，九塞之一也”^③ 的记载（这一记载客观上也成为杜佑说法的底本）作为旁证。并且，根据顾祖禹《读史方輿纪要》中关于“句注以山形勾转水势注流而名”以及阎若璩“曾有人登雁门，逾夏屋，极目于句注、广武之间，而知陉山形如人字”的说法，认为：“句注的研究视阈可放在整个‘代州’境内，而非局限于滹沱河以北的山脉。”而当视野放宽后：“代州域内滹沱河南北之山脉应视为一体。南北两脉于今繁峙以东勾连而呈‘纡曲’之势，即所谓‘人字’之头，滹沱河源出其中而西流，整体上恰好体现出‘山形勾转水势注流’的山川大势。”^④ 这样也就更应该将峪口确定为东陉关。可以说，这是以往认为东陉关为峪口的观点中所没有的视角。

确实，如果依据杜佑《通典》和酈道元《水经注》中被引用的佚文，东陉关似乎就在峪口

① 参见续楠、王海：《“雁门关东陉说”辨误及相关问题》，《中国地方志》2022 年第 3 期。

② 杜佑：《通典》卷 179《州郡九》，中华书局，1984 年标点本，第 953 页。

③ 这段话在今本《水经注》中没有。陈桥驿在注释《水经注》卷 10“漳水”中“又东北过阜城县北，又东北至昌亭，与滹沱河会”有言：“殿本卷首《校上案语》说：‘《崇文总目》称其中已佚五卷，故《元和郡县志》《太平寰宇记》所引滹沱水、泾水、洛水，皆不见于今书。’……此河今本《水经注》已亡佚，赵一清曾辑录佚文，在其《水经注释》中补成一篇。”酈道元著，陈桥驿注释：《水经注》，浙江古籍出版社，2013 年，第 153 页。

④ 续楠、王海：《“雁门关东陉说”辨误及相关问题》，《中国地方志》2022 年第 3 期。

一带。但是，为什么多年来大多数人又认为东陉关是今之雁门关，是相对于古之雁门关（即铁裹门）而言的呢？换句话说，杜佑《通典》中认为的峪口为东陉关的说法为什么没有被人们普遍接受呢？按说，杜佑作为唐朝人，又经历了安史之乱，知道郭子仪是在打败叛军高秀岩部并收复云中和马邑后由大同盆地进入忻定盆地前“开东陉”一事，这也是《旧唐书》和《新唐书》均做过介绍的。但是，也正是因为郭子仪“开东陉”一事的影响之大，使得杜佑虽然在《通典》中介绍雁门郡时提了东陉关，却将其位置标注在“郡南三十里”。而顾祖禹在其《读史方輿纪要》中也沿用了这一说法：“东陉关，在州南三十里，所谓雁门有东陉、西陉之险也。”^①之所以如此，我认为重要的原因是杜佑没有考察过此地，所以，虽然雁门郡“郡南三十里有东陉关，甚险固”是一个说法，但是，后人却不应该将之作为判定东陉关所在地的依据。假如东陉关在峪口，那么，唐朝郭子仪“开东陉”这一影响较大的事情，应该在由峪口经岗上、八达翻山越岭到五台县的路途中留下开路的痕迹甚至民间传说，但是，这些内容在该路径中从来没有被人谈起。

《“雁门关东陉说”辨误及相关问题》一文还提到：“雁门一地自古有西陉阻断北犯之敌，以控守南北交通要道。设置于滹沱河南岸的东陉，则可对于经灵丘进入太行山西麓的东来之敌，扼阻在河谷道上游一线，其于河谷道东向交通的作用亦不容忽视。”^②那么，令人疑惑的是，郭子仪的部队既然能够控制代州，为了防范灵丘之敌西来，为什么不前往繁峙的平型关（当时还没有这个名称）一带设防？因为那里的地理状况更容易阻止敌人。而从滹沱河到峪口有10华里左右的平川，不筑城堡，不修工事，仅仅守着峪口，能够阻拦由东而来一直向西的敌人，谈何容易？

再看《水经注》中的说法时，我认为只要将《“雁门关东陉说”辨误及相关问题》以及其他人所引用的原文重新断句为：“雁门郡，北对句注、东陉，其南九塞之一也”，问题同样不难回答了。换句话说，句注、东陉是并列关系，而非前一句与后一句的承接关系。而且，这也与当时雁门郡的位置相符合。因为，三国时期，雁门郡已经由雁门山北面的阴馆迁徙到南面的广武（今代县古城村西），北魏时期，由于地震，又由广武迁徙到当时的上馆城（即后来的代州城西关）。光绪《代州志》在介绍代州城时就说过：“州城，古上馆城也，后魏明帝自广武城东移于此，为雁门郡治。后周置肆州，隋改代州，历唐迄元，并因之。”^③这样，作为北魏时期的酈道元在介绍雁门郡郡治时才会说“雁门郡，北对句注、东陉”。至于“其南九塞之一也”一句，则是确认句注（西陉）和东陉为历史上所说的九塞之一。而这一句理解起来的麻烦是“其南”二字。既然不少人认为《水经注》这段话有错简之处，如果“其南”为“其乃”^④之误，将原文调整为“雁门郡，北对句注、东陉，其乃九塞之一也”，那么，歧义也就不存在了。而这也与“天下九塞，句注其一”的说法相符。另外，还需要看到的是，宋代之前，因为东陉关水多不易行走，所以走的人不多。比如，《北史》记载：河清三年（564），突厥由晋阳还“至陉岭，冻滑，乃铺氈以度。胡马寒瘦，膝已下皆无毛，比至长城，死且尽。乃截槊杖之以归”^⑤。而光绪

① 顾祖禹撰，贺次君、施和金点校：《读史方輿纪要》卷39《山西一》，中华书局，2005年，第1854页。

② 续楠、王海：《“雁门关东陉说”辨误及相关问题》，《中国地方志》2022年第3期。

③ 广荫、杜松年修，俞廉三纂，卢培青编校：光绪《代州志》，代县史志办（代县八方印刷厂），2007年，第98页。

④ 崔焕奎：《雁门双关考》，王凤岗主编：《雁门关志》，三晋出版社，2010年，第787页。

⑤ 《北史》卷51《齐宗室诸王上》，中华书局，1974年标点本，第1845页。

《代州志》在介绍此事时特别指出是“今关道”。换言之，今天的雁门关因为一直就在那里，自然会被人们称之为与西陉关相对的东陉关。

至于“代州域内滹沱河南北之山脉应视为一体。南北两脉于今繁峙以东勾连而呈‘纡曲’之势，即所谓‘人字’之头，滹沱河源出其中而西流，整体上恰好体现出‘山形勾转水势注流’的山川大势”，我认为实在是一种为了将东陉关确定在峪口的牵强说法。首先，“勾注以山形勾转水势注流而名”和阎若璩所说的“登雁门，逾夏屋，极目于句注、广武之间，而知陉山形如人字”具体所指的是“句注”“陉山”以及“句注、广武之间”的地貌本身而非滹沱河作为源头的整个繁峙与代州的地形。这样，才有了句注“以山形勾转水势注流为名”的解释最早出现在《河东记》当中。^①其次，如果将整个繁峙、代州的地貌看作“人”字形，而以滹沱河居于其中西流，从而确定“山形勾转水势注流”，那么，类似的两山夹一川、而且其地貌可以呈现为“人”字的地形在中国来说太多了，难道我们都可以将它们称之为“山形勾转水势注流”进而命名为“句注”吗？

二 “东陉关”也不在胡峪

其实，就东陉关具体位置提出不同意见的除了杜佑等的说法外，1983年史念海、曹尔琴也曾经发表过自己的看法。在《论雁门关》一文中，他们认为：东陉关不在滹沱河南，如果在滹沱河南，“则句注、东陉显然两地，如何合起来以当九塞之一？这是不待再作剖析的道理”。同时，史念海、曹尔琴还特别指出：“治舆地之学者，当从实地考察的所得中来与前人记载相考证。不亲临其境，不核对有关史事，而徒陈陈相因，祖述勿失，这就难免永远是‘剪不断、理还乱’了。”^②显然，杜佑就是因为没有实地考察过雁门关一带的地形，才会说出东陉关在“郡南三十里”这样的话来。但是，在排除了峪口为东陉关的说法之后，他们的看法却是：东陉关为胡峪。

之所以得出东陉关为胡峪的说法，史念海、曹尔琴的理由是：唐代以后，雁门关的名称多见于记载，但已经不在西陉，而是在今天的位置，可人们又不提东陉，“而胡峪山有东津口，当是东陉的所在地”。何况，宋代为了防辽，在句注山设有西陉、壶谷（即后来的胡峪）、雁门三寨。胡峪“名为寨，实际上和关的作用相仿佛”。雁门关自成一路，与其他两路并列，这样，雁门关之西的为西陉关，之东的胡峪也就是东陉关了。

针对《论雁门关》一文的观点，石鸿声、王杲升提出不同意见，他们认为：东陉关就是现在的雁门关。^③在论述过程中，同样拿出了历史上的有关说法和对于有关说法的辨析。其中，除了具体的历史记载之外，还有唐朝武元衡的诗歌《度东陉关》（亦作《度东陉岭》）。

而我认为，《论雁门关》一文的观点同样难以成立，理由有如下几点：

第一，胡峪附近虽然有东津口这一说法，但是并不能将之断定是东陉关的所在地。光绪《代州志》载：“胡峪山，在州东北四十五里，有东津口，或以为即东陉关也。”^④其中的“或以为”也就是有人这样说过，但是并不确定，也没有为作者认可。因此，以并不确定的说法作为

① 参见广荫、杜松年修，俞廉三纂，卢培青编校：光绪《代州志》，第78页。

② 史念海、曹尔琴：《论雁门关》，《地理知识》1983年第3期。

③ 参见石鸿声、王杲升：《〈论雁门关〉质疑》，王凤岗主编：《雁门关志》，三晋出版社，2010年，第774—780页。

④ 广荫、杜松年修，俞廉三纂，卢培青编校：光绪《代州志》，第80页。

依据，结论很难使人信服。也可以说，光绪《代州志》的作者在修志时是尽量博采众说的，而如何对待各种说法则需要具体使用者的辨析。还有，史念海在《与代县友人论雁门关书》一文中也谈到：“屏蔽代北的高山，就是句注山和夏屋山。句注山也就是陉岭。”^① 我们都知道陉岭（句注山）在西，夏屋山（本地人称之为草垛山）在东，而胡峪又在夏屋山之东，这样，由在西的陉岭（句注山）来确定东陉关与西陉关显然更为合理。如果将胡峪确定为东陉关，那么，确定的标准显然是混乱的，也不符合常理。

第二，历史记载中人们谈雁门关多而谈东陉关少是事实，原因是雁门关比起东陉关来知名度更大，同时，说得少并不是没有说。比如，唐朝武元衡就在《度东陉关》一诗中写到：“又过雁门北，不胜南客悲。”显然，武元衡是由东陉而非西陉走到雁门关北面的。史念海虽然由此诗判断东陉关不在滹沱河南，而又认为是在陉岭上的胡峪，实在让人不好理解。另外，宋朝时辽兵曾经在雍熙三年（986）由胡峪入侵至代州城南门外，结果被杨业的继任者张齐贤率兵打败。^② 而《宋史·张齐贤传》中谈到胡峪时的用词是“湖谷”（《宋史·地理二》中的用词是“胡谷”），如果是东陉关，以郭子仪“开东陉”的影响和东陉关的重要性，《宋史》的相关篇目中也应该出现东陉关的字样而非只是“湖谷”（或者“胡谷”）。由此可见，说东陉关为胡峪同样难以成立。

第三，关于郭子仪“开东陉”一事，我认为应该是郭子仪派工兵将东陉关道上不利于车马行走的障碍清理掉，从而使得部队能够更好地行动。这里，我们需要回顾一下郭子仪当时面对的形势。天宝十五载（756）正月，郭子仪罢云中之围，推荐李光弼为河东节度使，同时，再从朔方发兵。二月，李光弼由太原经过井陉到达常山（今河北省正定）。过了几天，郭子仪才到达代州，到四月时才过井陉与李光弼汇合。显然，过了雁门关从代州就可以向西南的崞县（今原平）、忻州到达太原然后再向东过井陉。这样来看，从代州过滹沱河再由峪口走几十里艰难的山路到达五台县（具体线路应为今红表、杨白、东冶）再到定襄、忻州再到太原再到井陉，这对于行军来说是很不划算的。因此，峪口为东陉关的观点再次证明是经不起推敲的。

还有，当时云中（今大同）一带的叛军高秀岩部依然存在，胡峪比起东陉关来说离云中更近，而且，这条道路比起西陉和东陉来说更不好走。如果东陉关是胡峪的话，那么，郭子仪显然是给自己选择一条更麻烦的道路。另外，按照《论雁门关》一文的理解，郭子仪“开东陉”之前还有“关闭”东陉（胡峪）一说，目的依然是防范高秀岩部。那么，为什么不依然将之关闭而由作者所理解的西陉关与雁门关运兵呢？因为，这样才是更为方便也更为安全的方案。

三 “东陉关”即今之雁门关

到此，需要谈谈历史上关于陉岭以及相关的陉北、陉南和西陉、东陉的记载。

《史记·赵世家》中提到：“反高平、根柔于魏，反陉分、先俞于赵。”^③ 其中的“陉分”“先俞”一般认为分别指的是陉山和西隄。而《尔雅》有：“北陵西隄，雁门是也。”^④ 自然，由“陉山”可以知道有陉岭。《三国志·满田牵郭列传》中提到当时的雁门太守牵招“缮治陉北故

① 史念海：《河山集》（四集），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431页。

② 参见《宋史》卷265《张齐贤》，中华书局，1977年标点本，第9153页。

③ 《史记》卷43《赵世家》，中华书局，1982年标点本，第1819页。

④ 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2009年，第5688页。

上馆城”^①。《三国志·乌丸鲜卑东夷传》中也载：“田豫有马城之围，毕轨有陉北之败。”^②显然，说陉北意味着有陉南，同时也意味着是以陉岭为界。这些记载说明，在汉魏晋时期，陉和陉岭的概念已经受到人们的重视。《魏书·灵征志》则明确提出“西陉”一词：“太祖天兴四年春，新兴太守上言：‘晋昌民贾相，昔年二十二，为雁门郡吏，入句注西陉，见一老父’。”^③既然说西陉，也就是相对于东陉。而且，它们均在句注。同时，雁门关的名称也正式出现在北朝。《魏书·礼志》载：泰常四年（419）八月“辛未，幸代，至雁门关，望祀恒岳”^④。

显然，“陉岭”应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就大的东西走向来看，可以分出陉北和陉南；就小的南北方向而言，于是有东陉和西陉。作为基本呈东西走向的恒山余脉中断的地方，雁门关所在的具体位置上正好有两个大的可以通行的豁口，从而形成东陉关与西陉关这样两个通道。同时，东陉与西陉之间又是沟壑相通、彼此相联。也正是因为陉岭上这一特殊的地理地貌，所以有了正史和方志中的有关记载。比如：

《新唐书·地理三》介绍代州“雁门县”时就说：“有东陉关、西陉关。”^⑤《新唐书·回鹘上》载：唐代宗大历十三年（778），“回纥袭振武，攻东陉，入寇太原”^⑥。由上述文字可知，回纥一破东陉就直奔太原，这里的东陉作为郭子仪所开之东陉，显然不可能是峪口，也不可能是胡峪。因为唐朝在代州设有总管府，回纥由胡峪到太原需要经过代州城，城内的部队不可能轻易放过他们。

万历《代州志》提到：“雁门废县，去州西北四十里，即汉广武县，隋改雁门，有东西陉二关，今废。”^⑦我们不讨论汉光武县在何处，也不讨论东西陉二关在万历年间是否废除，仅就“有东西陉二关”，可见东陉关既不可能在峪口，也不可能在胡峪。

结 语

由上可见，陉岭（句注山）上的两个豁口因其一东一西而被人们称为东陉和西陉；又因为不同时代这里分别成为南来北往的重要通道（既是关口，又是关卡），因而又被称为东陉关和西陉关，于是有了从《新唐书》开始的出现于正史和方志的相关记载。而《“雁门关东陉说”辨误及相关问题》和《论雁门关》因为对于史料记载理解得不够全面以及对地理地貌考察得不够深入，故而得出东陉关在峪口或者是胡峪的观点。那么，通过上述的史料记载、地理位置以及相关分析，也就足以说明东陉关即今之雁门关。无论是峪口，还是胡峪，均不符合实际。

（作者单位：忻州师范学院中文系）

本文责编：周 全 宿万涛

① 《三国志》卷26《满田牵郭传》，中华书局，1959年标点本，第732页。

② 《三国志》卷30《乌丸鲜卑东夷传》，第832页。

③ 《魏书》卷112《灵征志下》，中华书局，1974年标点本，第2954页。

④ 《魏书》卷108《礼志一》，第2737页。

⑤ 《新唐书》卷39《地理三》，中华书局，1975年标点本，第1006页。

⑥ 《新唐书》卷217《回鹘上》，第6121页。

⑦ 施重光修，周弘禴纂：万历《代州志》，远方出版社，2004年，第45页。